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父亲李式金

○李广达 李静宜



一九三五年在清华读书时的李式金

时值上个世纪的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 80 周年之际，一位清华校友会的前辈约请我们家人，写一下有关父亲李式金当年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事情。在和家人准备这篇文章、对过往年代进行追忆时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父亲李式金，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。在清华读书时，曾积极投身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我们兄妹几个小的时候，听父亲谈到过，很引以为傲。但父亲讲起这段历史，对个人做的工作，一直轻描淡写，十分低调。我们对其间的过程，也所知有限。稍有详细一点的了解，是多年以后，在父亲、母亲故去后，我们兄妹整理旧家的东西，从母亲存放的一个旧皮箱里，看到父亲、母亲留下的一些文字，包括父亲的日记、自传等。过往岁月的吉光片羽，得以在其间闪现。

父亲写有一个类似履历的自传，其中，对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情况作了如下记载：

“在我们读清华时，正是日寇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，百灵庙的变乱，平津的人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不痛恨入骨，而当时政府的一味‘退滚’，更使人愤恨。风传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了，这个委员会的成立，有日帝作后台，北平市的学生，在此便不能忍耐了，因此掀起了‘一二·九’运动。我们清华同学大队行进至西直门，城门已关了，我们转由西便门，冲入城内，与城内大队汇合，当时沿途高呼口号，喊出久欲喊而不能喊的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’，热血沸腾，心中畅快！当第一声喊出时，我们真是不禁涌出了热泪！这次游行，虽为宋哲元水喉、大刀队所阻，但是已振起平津的人心。”

接下来，父亲在自传中，写了当年他和清华大学同学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前后的事情：

“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喜欢参加学生运动，我曾二次任学生会的干事，又曾任两广同乡会的会长，又负责地理研究会、求知学会等。当时同任学生会干事的有黄诚、蒋南翔、姚克广等。清华学生会分左右二派，左派开会的地点在大礼堂，实在是全体同学的会，叫做大礼堂派；右派开会在同方部，仅是少数的有钱的子弟



1936年11月中旬，清华绥远抗日前线服务团部分团员，左起：武衡、李式金、苏先勤、绥远省立一中校长、黄汉炎、居浩然

们而已。这表示清华是前进的。

这几年来平津实在是多事了，日寇得寸进尺，而冀察委员会会长宋哲元为献媚日寇及南京反动政府，对平津进步先生同学常加捕追，平津学校师生失踪的被捕的常有所耳闻，清华自不能例外，冯友兰、张申府……相继被捕，进步的同学被追迫不敢睡在自己的屋里，今日睡在一个同学的房里，明天便换在另一个，然而统治者仍不放过，为一网打尽起见，六月某号（记不清楚）清华园便被大批军队包围，宋哲元的大刀队把清华园层层包围起来，他们的大刀枪炮，不指向日寇，而转向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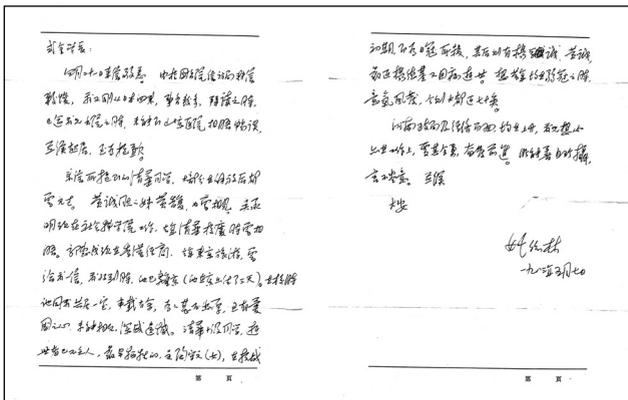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我们被迫退到体育馆，然后一个个被绑出去，我们不知道黑名单上是否有名，这样到早上才被释放，清华这样被包围了一昼夜，引起先生、同学的无限

愤慨，这年的大考便停了，改在暑季后补考。

这年的寒假，平津学生有百数十人到西山受训。当时的阎锡山伪装进步，接受牺牲同盟救国会的建议，邀请平津的学生到太原训练，当时清华学生有二十余人前往受训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受训地点在太原国民师范。

这次受训，早上四时起来，晚上八时即寝，经过实在是军事的生活。机关枪、迫击炮也学习过了。

寒假完毕，我们回到了清华。清华的功课是很紧张的，我们一面要应付功课，另一面，则因时局动荡，不能好好念书。南京政府当时对抗日似无诚意，清华组织了南下自行车团，当时我的同房徐煜坚（那时他是先锋队队员，现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事）便参加这团体，受了好多折磨，才到南京。此行，他们也得不到结果，其愤慨可知。记得我们曾相约定：我们必须参加抗日战争，牺牲不惜，未死者须为死者复仇！那时候，日寇对我们的侵略，实在是每个青年都不



1983年5月7日，姚林林给李式金的信



李式金与家人合影

能忍受，而有与之拼个‘你死我活’的心理了……”

这些文字，是父亲仅存的、关于他在读清华时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前后事情的真切记录。说起来，1950年父亲从执教的台湾大学回来，任厦门大学教授时，会写有这段文字，也是因那时候正值解放初期，处于翻天覆地的时刻，一个旧时代要改换为新时代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交代。父亲因此比较详尽地记录下那段历史。其他留存的，记载有相关父亲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文字的东西，也只有父亲到河南大学任教后，对此自传修订了个别字句的誊抄稿。

1983年4月，父亲患重病，在北京医院手术。其间，父亲如同不少在晚年的患病者，开始忆旧。念及同学情，父亲给当

年的清华同学姚克广（即姚依林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）写了一封信，信里细数了当年清华同学的一些情况。其中，谈到父亲能忆及的，当年他与姚依林曾同任学生会干事时，学生会中的蒋南翔、刘毓珩、何炳棣、黄明信等同学。还谈及当年也是参与领导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杨德基（杨述）同学，写到杨述在清华时，住父亲隔壁，曾委托父亲主持求知学会。而对信中谈及的参与组织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黄诚同学，我们兄妹则印象深刻，父亲生前曾多次谈到过。黄诚1942年牺牲。父亲在给姚依林的信中写道：“黄诚之姊黄馥，嫁西北大学张西堂教授，已经去世。当时黄馥语我黄诚被害于上饶集中营，其母不知，常常流涕，倚门而望，企其为来也。”（注：父亲1940年至1946年在西北大学任教）

姚依林在回信中则写道：“清华十级同学，逝世者已不乏人，最早牺牲的，是陶学文（女），在抗战初期，即为日寇所杀，其后则有杨学成、黄诚，最近杨德基又因病逝世。想昔年均处在弱冠之时，意气风发，今则大都已七十矣。”

往事已矣，却并不如烟。今天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80周年之际，我们拂去历史的浮尘，回望当年于清华读书的父辈们，在国家危难时，离开书桌，走向抗日的前沿，很为当年父辈们的英勇气概和担当精神所感佩！当年，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中心“北平学联”总部，就在清华园，作为清华出身的父辈的儿女，我们深感骄傲！

（本文转自《河南日报》2015年11月18日）